

者的区别仅仅在于，不同于竹内好与石母田正的强烈移情，丸山真男对底层民众的视线更加冷峻一些，不是一味的美化，因为他经历过和认识到日本农村共同体（尊皇意识、在乡军人）同样可以成为法西斯的温床。至于竹内好与石母田正，应该说他们的民族论也不会被简单回收战前那种自上而下的、试图建构同质化民族国家（nation - state）的现代性疾患之中。他们念念不忘的“日本民族”，如果像柄谷行人所说，是一个无法祛除的假象，那么他们在现实之中唯一能做到的，也就是要努力保证这个假象的伦理性和独立性，让它成为一个值得尊敬和认同的对象。

既然孤独无助、原子化的个体们可以酝酿出极端民族主义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考虑，健全的“民族”想象也不是不可以变成某种抵抗原子化、共享情感和行动力量的政治性同盟。因此，为了重建与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新民族主义，我们需要更加冷静地鉴别民族（nation）和国家（state）的差异，平等地参与民族意识（同时也关系到世界意识）的塑造。既要激活民族主义的健康活力，同时又要抵制那些如影随形的暴力冲动的诱惑。事实上，仅仅到了1960年代，日本便出现了一个具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转向。例如在1950年代末登上文坛的江藤淳等文艺批评家打起了“否定战后”的旗号，把日本战后的反战和平、民主主义文学和思想的历史贬低为“丧失的历史”、“自我破坏的历史”，试图建构另外一种解读文学、民族与国家的新话语。所以说，在民族主义场域之中的角逐一直在持久反复，对此的凝视与介入依然极有必要。

（原载于《山东社会科学》2018年第6期）

## 全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

汤重南

至2018年，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已经签订40周年。从世界历史角度考察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、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前的中日关系，概括地说其内容有三：一是从远古走来的民族起源、形成和融合史；二是古代（包括日本史的中世、近世）的两千多年占主流地位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三

次高潮的历史，以及古代倭寇、三次战争和“锁国”“海禁”史；三是近代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。

在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中，日本从中国吸收、引进了大量先进的科学、技术和文化、艺术，甚至中国在政治、经济方面的一些制度、规章。但中日两国间也有过三次战争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，这一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，而日本在世界史上仅有大化改新、武士、德川幕府等极为简略的记述话语，于世界历史的意义不大，而中日文化交流史则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。

时间转向近代。两国在 19 世纪中期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，但两国关系从日本 1868 年明治维新后开始发生逆转。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，而中国逐渐走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。近代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 70 年的侵略。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史，主要是从 1874 年日本出兵侵我台湾至 1945 年间的七十年侵华史和中国人民反抗斗争史。当然，其间还有 1896 年开始的以中国人到日本留学热潮为中心的长达 20 年的中日文化交流高潮。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，已具有世界历史的某种意义。

从 1931 至 1945 年，是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。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，已完全具有世界意义。

战后初期，日本被美国事实上单独占领，进行了历史性的民主改革，特别是制定了“和平宪法”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宣告成立。在“冷战体制”下，中日两国分处两个不同阵营，官方正式关系长期处于断绝状态。但在新中国成立不久，两国间就频繁开展了大量的民间交流，极大地促进了官方外交。“以民促官”、半官半民，成为发展中日关系极为宝贵的经验。

1972 年 9 月，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，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，距今已 46 年。

第一阶段是从 1972 年至 1989 年。中日于 1978 年签订了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，今年适逢 40 周年。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，促进两国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。

第二阶段是从 1990 年至 2000 年。在这一时期，冷战结束，国际形势巨变，中日关系亦有大变化。1991 年 8 月，海部首相访华，提出了“世界中的中日关系”这一概念，在与中国总理李鹏会谈中首次向中国提出了民主、人

权、裁军、环保等地区或全球问题，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开始改变，试图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和限制中国的意图。当然，希望建立超越中日双边关系、立足于亚太甚至世界的中日关系等，则具有积极意义。海部后的日本历届政府基本上都予以肯定和继承。中国政府虽未直接评价，亦未表示异议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时期，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为标志，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。其实质性的进展是中日的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发展，逐步形成并确立了“亚太中的中日关系”和“世界中的中日关系”。

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2年：这是构筑21世纪初新的中日合作关系的重要时期，也是中日结构性问题凸显时期。由于小泉纯一郎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，中日关系出现诸多问题，而其责任在日本。但中日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政治、文化、军事，外交方面的合作亦迅速向纵深发展。

21世纪初期，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已经成立，并召开了第一、第二次会议。中日政府间的两国战略对话也已进行四轮。只有从长远、战略高度考虑和发展中日关系，才有出路，才有各自的尊严、利益和安全地区以至世界的共同利益，才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做出贡献。

(原载于《江海学刊》2018年第5期)

## 论《日美地位协定》的本质与影响

### ——兼论冲绳基地问题的法理根源

田 凯

《日美地位协定》是规定美军在日特权的日美间协议。以地位协定为核心，由《日美安全条约》、地位协定、“密约”及日本国内特别法等构成的“安保法体系”，在法理上确定了日本对美军事从属地位，并将该协定嵌入到国内统治结构中。“安保法体系”及其制度性支撑共同构成了规定日本对美军事从属的“法理框架”。日本将对美军事从属的压力传导至冲绳，导致冲绳基地问题的产生。地位协定是冲绳基地问题的法理根源。